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¹⁾ 教学的转向及其得失

赵 晓 晖

〈Summary〉

The Meiji Era is the key period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education at this time had also undergone a profound change. This thesis, by introducing this change from the aspects of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s the Chinese language, its pronunciation and content, the teaching idea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the results, and by analyzing its gains and losses, will hopefully draw upon these experiences from history in a way which may promote Chinese teaching in Japan and constructiv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day.

〈Key words〉

Meiji Era of Japan, Chinese education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很早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在世界汉语教学史上，日本的汉语教学以其历史悠久、成效显著而享有盛名。在长达数千年的交往过程中，日本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汉语教学经验，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富有成就的学者和优秀的教材。其中，明治时期（1868-1911）是日本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汉语教学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影响波及至今。

一、明治以前日本汉语教学的回顾

考古成果与历史资料说明，从远古开始就有少数中国大陆居民进入日本列岛，不同的文化互相交流，其间必然伴有语言的传播，然具体情形已不可考。公元5世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语教学出现于日本的宫廷之中，服务于汉学教育。公元7世纪时，中国语教学走进大学寮，虽附属于汉学教育，却也有自身的发展空间，汉字、阅读、语音、写作教学无一偏废。十世纪，中日往来高潮退去，日本假名系统成熟，中国语语音教学废弛，日语训读汉字的历史开始。十二世纪末大学寮废止，其后的四个世纪，中国语教学在社会上以多种途径进行。寺子屋给予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的机会；足利学校是培养汉学教师的基地；五山禅僧也是中国语教学的重要力量。江户时期的汉学教育与前代大学寮内相同，使用的是未经翻译的中国典籍，学习的场所有中央官学昌平黉，即昌平坂学问所，还有各种地方官学，即地方性的藩校，由各藩仿照昌平坂学问所建立而成。以其他形态存在的学校还有乡校和私塾，其中都有汉学教育。总地来说，日本历史上长期以来中国语教学服务于汉学教育，并没有按照语言教学的规律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语言教育与政教、德教不分。诵读经典，不是以发展语言能力为目的，而是为了熟读以后的共同研习，以求得对经典的深入理解。第二，教

学方式是以读写为主。第三，在教材方面，仍是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教材，基本没有专门的语言教材。第四，教师也非专门的语言教师，是以解读儒家经典，诠释社会道德为己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教师。

大概从汉代开始，中国的文言就开始分家，到了明清，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已经发展到了互相几乎不能交流的地步。在幕府的官学中，中国语教学体现在理解中文词句的意义上，它所进行的是书面语教学，重在理解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而这些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活力的。石崎又造在《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719年，有人向德川幕府八代将军献上了程顺则从清朝带去的教化一般庶民的《六谕衍义》，用口语写成。幕府命当时的大儒室鸿巢翻译。室鸿巢说：“俗语仅凭字义不可解也，通前后可略解之，然，乃推测也。所以，本书请令熟通俗语者译之。”²⁾ 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江户时期，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汉语教学形式。此时，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留下长崎一处港口与中国、荷兰通商。长崎港口的中日贸易，不仅使风物在两国之间交流，而且也产生了对于翻译的需要，于是在中日两国贸易中充当翻译的唐通事出现了。传统的汉学教育下的中国语教学所教的书面语不能胜任两国的贸易事务，因为书面语与口语差异很大，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即使是学富五车的鸿儒也难以胜任相关的口译工作。唐通事所使用的中国语主要是口语，因此出现了异于传统的汉学教育的中国语教学，即唐话教学。整个江户时期，隶属于汉学教育的中国语教学与服务于翻译事业的唐通事口语教学并行不悖。

二、明治时期日本汉语教学的转向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部分日本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开始怀疑、批判中国的思想文化。1868年的“明治维新”，确立了“脱亚入欧”的策略，不仅使日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使日本的中国语教育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下，日本的汉语教学逐渐从传统教学向近现代教学转变。

明治时期日本汉语教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对于汉语的认识和态度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直至18世纪中叶日本受西方科学文化思想影响出现“兰学”之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基本上都是在“崇夏、慕华”的氛围中进行的，即推崇、接受中国的文化，其中自然包括学习汉语、使用汉字、写作汉文，日本人民是将汉语当作一种文化的载体而进行学习的。由于日本文字系统的发展，同时又由于汉字具有跨越不同语音的标意媒介作用，十世纪后中国语教学普遍地脱离汉音，演变为中国汉字与汉学的教育。《宋史》中有关于984年日僧裔然入宋时的记载，反映了日本中国语教学的状况。“雍熙元年，日本国僧裔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裔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裔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³⁾“藤原”是平安时代最大的贵族，是当时的掌权一族，所以裔然是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然而他却“不通华言”，说明十世纪时日本僧人读经已用训读法。因为假名字母系统的形成，使训

读更加方便,可以将假名字母写在汉字旁来阅读,日本人阅读汉籍的难度要降低许多,但口语学习退居其次。德川幕府建立后,像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一样,需要建立一套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体系,这时候,日本还是从中国那里寻找理论,于是朱子学被推崇为治国的理论基础,同时还并聘请名儒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于幕府讲学,收藏各种中国经史子集。纵观日本历史可以发现,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从五世纪开始于宫廷后一直没有中断。日本的官学教育,是以阅读汉籍为摄取知识的方式,中国语教学隐含在各种学科的学习中。尽管中国语教学中所体现出的外语教学的特点越来越少,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工具,性质并没有改变。

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下,近代日本表现出对于现实中国的蔑视和对于中国文化的舍弃的倾向。这使得与中国文化相对应的“汉文”在日本文化教育界的位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是日本近代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设有法、理、医、工、文等学部,代表了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和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方向。在明治早期的国立帝国大学,英语、德语、法语是受到重视和承认的法定外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一项或两项,作为自己的第一外语及第二外语。而中国语和俄语,不仅没有作为第一外语的资格,连第二外语也没有开设过。一直到战后的1946年,东京大学的第一高等中学校才承认中国语作为第一外语。鲁迅研究专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家竹内好(1908-1977)在1941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今天掌握了一点像样的中国语,都是依靠自学和沾了少数中国语学者的著作的光,而决不是由于帝国大学。”正说明国立帝国大学在将汉语作为外国语认识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偏废。为了接受“西洋的近代文化”把外国语分成了担负“正”面作用的外国语和“负”面作用的外国语,汉语无疑是属于后者的,对汉语的态度发生了前恭后倨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一时期汉语在日本,不再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科学工具”而被认识和学习,汉语教育的主要阵地也不是正规的重点大学的汉语学科,而是各类专科学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如东京外国语学校、日清社、广运馆和支那语学校等。

(二)从教学语言和内容上来说,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学从以前的“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转变,并且大大增强了实用性教学。江户时期,航日的中国商船多由南京、宁波、厦门、广州等中国南方口岸启航,直驶长崎,当时在贸易中充当中国语翻译的唐通事使用各种方言与中国客商进行交流,而以“南京话”为主。1873年4月,中日正式建交。1874年5月,柳原前光作为首任公使赴北京就任,临行前找不到合适的中国语翻译,因为去北京需要懂北京官话,而此时的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乃至日本国内有数的几所中国语学校教的都是南京话。外务省深切认识到当时的南京话教育不敷外交之需,遂于1876年9月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选派三名学生到北京公使馆留学北京官话。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吸取教训,决定从1876年9月新学期起,改教北京官话,从北京招聘中国人任教师,由此开始了日本中国语教育从南京话教育向北京官话教育转换的时期,真正代表了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各类专科学校和民办培训机构中的汉语教学也从以前的注重中国文化的學習,即汉学教育转向实用教学,成为与外交、商贸等实际目的相联系的特殊教育。

体现在教材上,日本传统的汉学教育使用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列子》、《庄子》、《史记》、《文选》等经史子集。唐通事的教育编有专门的汉语教材,最著名的就是冈岛冠

山编的《唐话纂要》、《唐译博览》、《唐话便用》、《雅俗语类》、《字海博览》等，中级阶段还有“《译家必备》、《养儿子》、《三折肪》、《医家摘要》、《二才子》、《琼浦佳话》等，这些教科书，都是由唐通事编辑的。”⁴⁾高级阶段的中国语教学则是加强学生的中国文化、文学素养，教材有“《今古奇观》、《三国志》、《水浒传》、《西厢记》一类的口语小说，继而是《福理惠全书》、《资治新书》、《红楼梦》、《金瓶梅》等。”⁵⁾可以看出，在明治之前的汉语学习中，文化的比重极大，传统的儒家经典和文学作品自不必说，唐通事的汉语教材，已经将注意力从语言教学转向专业素质的培养及一些专业中国语，教学这些课程一是在于巩固学生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拓宽学生的视野，以能够很好地胜任唐通事的工作。在达成主要的教学目标时，所选用的教材也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涵，体现了语言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进入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汉语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特质。这时期最著名的教材当属《官话指南》、《谈论新篇》、《官话急就篇》等，但这些教材由于过度注重实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会话主义”的倾向，题材显得单调。此外还出现了一些速成之类的简单会话教科书，质量良莠不齐。汉语教学的内容过于注重实用性，政治性、商业性等尤为突出，有的甚至直接为军事目的服务，如《兵要支那语》、《日清会话 附军用语》、《军用商业会话自在 支那语自学入门》、《笔谈自在军用日清会话 附实测里程表》等。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时文、语法、辞典类书籍。语言不但有官话，还有各种方言。这种速成的、功利性极强的汉语学习形式，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但与之前汉语教学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为研究中国文化、促进日中友好交流而学习、推广汉语的倾向，并非没有，但非常薄弱。六角恒广先生在《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的“绪论”中指出：当时在日本传播的汉语，不是从现实中国吸收文化所必需的文化语学外国语，而是为了在向中国扩张侵略中起作用的实用汉语。汉语的实用意义，是在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等方面。汉语的推广和学习，是为了方便进入中国的日本人。

(三)从教学理念和方法上，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明治之前，无论是附属于汉学教育的中国语教学还是唐通事的唐话教学，教学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代私塾教育的翻版，遵循读一解一背的固定模式。表现为，在对于儒学经典的解读前，会专门教授学生朗读经典；唐通事在教儿童用中国语表达之前，也会选择一些儒学经典作为发音的教材让学生朗读，不同的是幕府官学中的朗读是用日语对汉字进行训读，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用日语来认读汉字，解决汉字的日语发音问题；唐通事的诵读，则是用中国语来读，这是因为唐话教学中诵读训练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中国语言而设。由于教育目的的不同，二者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各取所需，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在唐通事的教育中，掌握了中国语语音的发音要领后就要进行语言表达的训练，在初级阶段，学习者先要“学习二字话、三字话。既有练习发音的目的，也学习词语的意思和说法。然后进而学习四字以上的长短话。”⁶⁾二字话就是由两个字组成的词或词组，如高兴、好吃、天气等；三字话就是由三个字组成的词或词组，如不想去、真正妙等；四字以上的长短话，是学习四字以上的句子或短句组成的段落，如许久不见、今日天色好等口语中常用的词语和句子。在这一阶段学生通过学简单的词语和句子而扩大词汇量，掌握词语的意义。由学习二字话、三字话再到四句话、句子、句群的学习，句子的成分由少到多，让学生在学的过程中理解掌握汉语的组合方式，也就是对于语法规则的学

习。所以唐通事所用的教学方法是督促学生记忆、背诵，在读与背中理解句子结构，掌握语句的用法。

六角恒广在其《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中说在日本近代的中国语教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唐通事时的默记和背诵法，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以及汉语的教学理念、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语言自述集》为蓝本的《亚细亚言语集》成为日本的第一部北京官话汉语书，1881年，又在此基础上第一次出现由日本人自己独立编纂的汉语教科书——《官话指南》。据六角恒广统计，在明治时期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有300多种。这些教科书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专业的语音、词汇、语法书，有字典辞典，有商业、军用教科书以及各种读本，更有特色是出现了专门的女性用书。这些教材大多以贴近生活的问答、谈论为主，创设谈话情境，真实实用，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同时善于捕捉新生事物，并及时反映在教科书中。更重要的是，受《语言自述集》带来的西方先进的语言学观念的影响，日本人在汉语的学习上由之前的自发逐渐走向理性与自觉。《语言自述集》的西文字母标记方式，对北京话口语连读变调及轻声、儿化等语音流变现象的归纳，依据语法功能为汉语所做的词类划分以及对有关量词、“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语法功能的讨论等，为日本的中国语教育打开了一扇窗户，其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思想和以北京官话为研究对象的会话体系的确立，对沿袭“唐话”教学的日本传统汉语教育，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表现在语音上，用罗马字表音代替了以前的假名表音，准确性大大提高；在语法学习上，由以前主要依靠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体悟转变为显性的说明；在词汇上，有了词类的意识，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动词或者虚字典典等。《语言自述集》“给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带来的，是语言意识的觉醒，是语言教育方向的转型，是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历史性转折。”⁷⁾于是，以语言体系的变更为契机，日本的中国语教学及教科书编纂开始了一次由传统向西学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走入与国际化接轨的科学发展进程。

(四)不同的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必然导致不同的教学效果。在明治以前，日本人学习的目的，除了交际（如前往中国的使节和唐通事）之外，更多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解决日本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据《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⁸⁾十五年(284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次年，“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于王仁，莫不通达。”⁹⁾。由此不难发现，中国语教学在日本一经出现，就处于附属于汉学的地位，学习者与教学者都更重视汉籍中的微言大义，语言是汉学教育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汉语教学经飞鸟、奈良时代，历经大化改新，从宫廷的一隅走向了官学，走入了大学寮，成为官学中教育的重点，以恢宏儒学、培养经国人才为目标。圣德太子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成功的中国语学习者，史载他“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博士觉驾，并悉达矣。”¹⁰⁾在教学效果上，除了培养经世治国之才外，还出现了一大批用汉语写就的著作：在史学方面，八世纪时日本出现了第一部用中国语写成的史书——《古事记》，其后在日本兴起修史之风。在文学方面，公元八世纪，受唐代诗文盛世的影响，日本人也对汉诗的诵读与创作趋之若鹜，751年汉诗集《怀风藻》问世后，又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汉诗集在平安时代

相继出现，空海还创作了阐释诗歌理论的《文镜秘府论》。当然，由于学习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交际，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了不少口不能言汉语却精通汉学的学者。

明治之后，随着汉语教学目的的转变，大量的实用型汉语人才出现了。1879年底，陆军参谋本部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挑选12名学生、加上从其他地方挑选的4名学生共16人，派往北京留学2年。这批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陆军各镇台（师团）和士官学校教汉语。又如1900年创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该院以培养精通中国政治经济等有关中国的知识并能即时实际应用这些知识的人才为目标，所以第一届、第二届毕业生大部分都曾在日俄战争中参军，担任了高水平的翻译。书院的一大特色课程是每年一次的研修调查旅行，最后一学年还要利用暑假调查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各国的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况，最后写成调查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调查旅行的费用受外务省资助，而且调查报告书中包含有不少军事方面的内容，因此也有人怀疑这些学生进行间谍活动。中国1910年的《教育杂志》第九号“记事”一栏中也记载：“日人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会馆，将及十年。其历次毕业诸生，多习华语，易华服，潜入我国内地。或考察军政，或调查实业，必期有所得去。”¹¹⁾到1945年关闭为止，该院历届毕业生累计达4,711名，很多人是精通汉语的中国通，但也有不少参与了推进侵略中国的活动。

三、明治时期汉语教学转向的得失

以上，从对汉语的认识和态度、教学的语言和内容、理念和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学的转向。可以说，这一转向是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深刻变化，其结果有得有失。

明治时期日本对于汉语态度的变化给汉语教学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汉语的定位不够准确和科学，而且使得汉语丧失了应有的尊重和作为语言科学的地位，同时对汉语与日语的关系等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和偏误。如汉语和汉字的存废问题；传统的汉语、汉文同作为交际的中国语、中国话的关系，即汉语是否等于中国语，汉字是否等于中国字等，汉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外语的地位。正如六角恒广在《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一书中所说，明治维新以后到战败期间的汉语教育，体现了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和看法。当时由外务省开办的“汉语学所”，可以说只能叫“街道深处的语言学”。比起在学校里公开开办进行的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的“洋语学所”教授欧美诸语言来，简直是相形见绌。也就是说，那时，欧美诸语言是“高等的语言学”，而中国语则被认为是“下等的语言学”而已。当然，这种不正确的观念现在已经得到扭转，但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实力才是其语言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之基。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应该正确选择自己的文化依附立场，当然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习者都全身心地拥抱目的语文化，但是对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起码应该具有理性的认识，报以尊重的态度。

明治时期学习的汉语由“南京话”向“北京话”转变，这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明智之举。但与此同时，该时期的汉语学习过度关注学习内容的实用性、时效性，这种过度实用主义原则并不可取。这与之前附属于汉学的中国语教学相比，刚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学习汉语的

人目的各有不同，为交际而进行的汉语学习与为研究汉学而进行的汉语学习侧重当然应该有所不同，但是语言教学必须遵循语言教学的规律，在语言的初级学习阶段，语音、语法、语言的交际功能等要素必须加以注意，语言教学中必须融入相当的文化内容。相比之下，唐通事的汉语教材则在这一方面做得较好。到了高级阶段，通过大量阅读书籍能够对对象国的社会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在语言方面也能够扩大自己的词汇量，能够更精准地使用语言。明治时期开始的急功近利的语言教学观，今天仍有所表现。六角恒广先生认为，战败前的中国语教育，基本上以实用主义的会话教育为目标；而战败后，则偏离了会话教育，向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而服务的文化语言教学转变。¹²⁾但那主要是针对中日建交之前的情况而言，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专用目的汉语教学出现，学习者文化底蕴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知识爆炸，多媒体兴起，很多学习者面临着阅读量大大不足的问题。中国自“五四”以来，虽然号称“言文一致”，事实上汉语仍是一种口语和书面语距离相对较远的语言，如果没有大量、优质的文学阅读，学习者很难真正掌握汉语的优美与典雅。在这一点上，明治时代开启的急功近利的汉语学习观直至今天，仍然应该引以为戒。

从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上，明治时代开启了向现代语言教学迈进的路子。语言教学从自发走向自觉，有了更为明确的第二语言教学意识，但是不可忽略的是，随着语言教学理性的增强，学习者的练习在减少。举例来说，在明治之前的语音教学阶段，学习者要经过大量的机械反复模仿练习，熟悉汉语的语音，特别是在进行唐话教学时对学习者的年龄要求十分严苛，唐话的教育要从儿童智力未启的时候，大概在孩子刚刚学话的婴儿期就要开始，以培养孩子的发音习惯，让其长大后具有学唐话的能力。当孩童长到五六岁时就进行正统的中国语教育，在进行系统的中国语教育过程中，所要学习的第一门功课还是语音。在语音的教学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练习五十音图，练习正确地发日本语音。“在进入唐话发音教习之前，有必要先训练、矫正日本语的发音。”¹³⁾第二阶段是将《三字经》、《大学》、《论语》、《诗经》等儒学经典作为教材，不讲习其义理，只将其用作发音训练的材料，进行集中的语音训练。在学习二字话、三字话的阶段还要巩固语音，不断进行纠正强化。在词汇、语法方面也是如此，先让学生读汉籍，进而教师讲解一些词语、短句，学生理解后熟读成诵，印在头脑中，当使用的时候已经能够形成刺激反应，选用正确的词句进行表达。虽然长期大量的背诵练习极为艰苦，但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汉语语感，使得他们在使用汉语时能够娴熟自如。这对于今日的对外汉语教学有启示性的作用，语言学习可能是认知内化与习惯养成的双重过程，要让学习者对目的语一触即发、运用自如，“语感”的作用不可忽视，任何高科技都不能代替在学习过程中的大量操练。今天的汉语教学，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记忆和背诵的作用，过于重视显性调节而忽视了隐性调节。

从教学效果上来说，学习语言、了解文化，一般而言总是为了交流与沟通，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形下，也有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世人应该鉴往知来，引以为训。重温日本明治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日本汉语教学的转向及其得失，有利于我们认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经验，更好地服务于今天的汉语教学和中日文化交流事业。

注

- 1)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汉语在日本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汉语”、“中国语”、“支那语”、“华文”、“华语”、“唐话”、“清语”等。本文采用“汉语”的说法,从日本的立场出发,有时也使用“中国语”。
- 2)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清水弘文堂书店,1967年,第136页。
- 3)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31页
- 4) 武藤长平:《西南文运史论》,东京冈书院,1926年,第51页。
- 5) 同上。
- 6)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
- 7) 陈珊珊:《〈语言自述集〉与十九世纪日本中国语教育》,《走向世界的汉语教学探索——第四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 8) 日本第15代天皇,在位时间为270至310年。如按日本珂通世博士所说,实际纪年当是432-572年间。
- 9) 见舍人亲王奉救撰,浦木裕编译:《日本书纪》。
- 10) 同上。
- 11) 王桂:《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 12)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
- 13)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参考文献

- 陈珊珊:《〈亚细亚语言集〉与十九世纪日本中国语教育》,《汉语学习》2005年第6期。
- 陈珊珊:《〈语言自述集〉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 王幼敏:《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6年第4期。
- 闻广益:《近代日本汉语教育管窥》,《人文丛刊》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10年。
- 钱婉约:《论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发展的曲折性》,《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5年第2期。
- 李无未 李逊:《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语教科书》,《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
-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王顺洪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徐晶:《古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 徐丽:《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